

2020，披荆斩棘

(下)

出不去的留学生

本报记者 尹晓燕

离上课只有10分钟了，马骁抱起电脑冲出宿舍。那会儿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50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栋教学楼灯火通明，一直到天亮，都有人在那里上课。

2019年底，高三学生马骁收到了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随后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却让他无法如期飞赴大洋彼岸。在马骁此前就读的北京某所公立中学的国际部，220多名毕业生跟他遭遇了同样的困境。“除了大约30人选择休学，其余的都像我一样，在家门口留学。”马骁说。

一开始，美国南加州大学大一学生刘博宁很难接受现实——他连学校宿舍的室友都选好了，最后只能在家中的卧室开始大学生活。昼夜颠倒，网课没有参与感，刚开学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刘博宁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中。有一天上课时网络不通畅，看着自己毫无表情的脸久久卡在屏幕上，那一瞬间刘博宁崩溃了，操起电脑狠狠砸在地上。

和刘博宁一样，不满20岁的羽嘉大概从初中起就一直为“申请国际名校”这个目标准备着。等她终于拿到理想中的offer后，却遭遇了也是史上最强大的“不可抗力”。

“三次签证预约全被取消了，我觉得全世界都在与我为敌。”疫情出现初期，羽嘉一直抱着“过一阵就好了”的期望，随着时间推移，期望变成了失望。

线上学期开始那会儿，羽嘉夜里上课白天失眠，大把大把地掉头发。爱美的她，这一年穿得最多的是睡衣——有时候她一个星期也不出一次门，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本该远飞的孩子滞留在家，同样焦灼的还有父母们。羽嘉的妈妈每周变着花样煲汤、做菜，保证女儿半夜也有吃有喝。“她屋里亮着灯，我就跟着睡不着，早上出门前还要蹑手蹑脚生怕吵醒她。”时间长了，羽嘉妈妈觉得自己快快撑不住了。

根据教育部2020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时中国海外留学人员总数约为160万人。疫情发生后，其中不少人陆续回到国内。在刚过去的2020年秋季学期，网课是他们中大多数与“学校”的最大关联。

相比起来，马骁是幸运的。经过塔夫茨大学的协调，该校滞留在中国的学生可以在北京师范大学借读，进行线下国内课程+线上美国

课程的混合式学习。塔夫茨大学请了专职人员照顾这些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去年冬至那天马骁和同学还一起包了一顿饺子。

“中国985+美国前30”，马骁笑称这是疫情带来的“福利”，否则他不会有机会感受国内高等学府。马骁选了两门线下课，三门线上课，在北京时间和波士顿时间中来回切换。

北京时间晚10点，纽约时间早10点，伦敦时间下午3点……在家留学生的这段时间逐渐失焦。有一次，刘博宁把凌晨两点的闹钟错定成下午两点，结果错过了一场考试。也有国外大学增加了课程录播服务，马骁一门讨论课的老师主动召集所有中国孩子，把原本设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半的课调整到晚上10点。

刘博宁换了新的电脑，升级了网络，每天在笔记本上写下24小时内要做的事情。后来，他还在卧室里放了一个小冰箱，以便“深夜食堂”随时开张。

“心静下来，学习效率还挺高。”刘博宁说，没有住宿费、保险费等支出，这学期他给爸妈省了不少钱。

这样的自我安慰既实在又无奈。缺少社交，难以感受鲜活的大学校园乃至外国环境氛围，始终是刘博宁们目前难以解决的痛点。在留学生家长微信群里，有家长抱怨，“花着几万美元的学费上‘函授’，真的亏大了。”

就连置身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的马骁，由于特殊的上课方式和时间，事实上也很难参与社团和校园活动。有时候坐在教室里，他会觉得恍惚，“这是别人的学校，与我无关，可我的归属又那么遥不可及。”

上网课期间，羽嘉看了许多辗转多地到达美国的经验分享：飞去东南亚国家办签证，双向隔离，耗时一个月，价格高昂——虽然到时候依然是上网课。她有点动心，把相关的信息发给了母亲。回复来得很快：与你的安全、健康相比，学业永远都只能排在后面。

很快，欧美大学2021年的春季学期就要到来，有的获得签证的学生准备接种疫苗后“勇敢”向前走，但大多数的留学生家庭依然选择观望。经历了最初的慌乱、焦虑，这个群体似乎已经适应了曾经确定的、可以预期的轨迹一去不复返。

羽嘉没再执着于立即出国。学期后半段，她每天午夜时分会发一条朋友圈“早安，一天开始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再发一条：“下课，准备睡觉，晚安。”

在武汉期间，邓磊(左)为新冠肺炎患者插管。受访者的供图

本报记者 张翀

带着公司刚发的一盒口罩，李涛回到了位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家。进门，摘口罩，将贴近口鼻的一方向外折好，用口罩带绕紧后扔进垃圾桶。用酒精喷一喷新发的口罩包装盒，搁在专门的架子上。然后，他去厨房洗手。

回家洗手，到公司洗手，扔了垃圾洗手，拿了快递洗手……李涛说自己过去是个“粗人”，他觉得2020年自己洗手的次数绝对顶得上此前近10年的总和。

另一个不断重复的动作是戴口罩。武汉的夏天是火炉，微胖的李涛又很怕热，有一天没戴口罩走在马路上，人们看他的眼神像是他没穿衣服，“那次之后，再热我也不敢摘口罩了。”

距离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已过去了8个月，新冠病毒给这座城市留下的影响，有的在慢慢淡去，有的则像烙印一样难以消除。

刚过去的2021年元旦假期，武汉地铁里摩肩接踵。但李涛记得，地铁恢复运营后一个多月里，乘客一直少得可怜。即使是相识的人同行，进了车厢也会自动间隔就座。

“那时候，很多人心里迈不过公共交通这道坎。”专车司机刘欢一面给前一位乘客使用过的座椅消毒一面说。过去8个月，刘欢的生意明显比往年好，“乘客说花钱买安心”。还有的人，一度宁愿单程步行五六公里上下班也不搭公交或地铁。

直到去年5月，武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城市上

张龙很忙，忙到只能抽空接受采访。在他身后，森讯隆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昼夜不停地轰鸣着——这家以出口电路板为主要业务的企业订单已经多得做不过来了。

这与2020年三四月份时的冷清形成了强烈对比。那时候，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同时期，全球多个国家因疫情进入紧急状态，这直接导致在江浙、广东一带，许多像森讯隆一样主营外贸业务的中小企业车间依然处于“静音”状态。“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和欧洲多国疫情还在蔓延，已有订单被退订或要求延期，意向订单几乎为零。”作为森讯隆主要负责人之一，张龙好多年没有这样“休息”过。

海关数据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亿元，比2019年同期下降6.4%。其中，出口3.33万亿元，下降11.4%；进口3.24万亿元，下降0.7%；贸易顺差983.3亿元，减少80.6%。

张龙办公室的墙上，贴着许多往年

根据排班，2020年的最后一天，邓磊值夜班。从医16年，他早已习惯了逢年过节不放假，不过在走进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之前，邓磊还是默默地许下了第一个新年愿望：今夜收治病人数为零。

“或许因为这是太不平常的一年。”12月31日下午，本该睡觉来养精蓄锐的邓磊怎么也合不上眼。同样湿冷的天气，同样喜庆的节日氛围，邓磊的思绪被牵回了2020年1月下旬的那一天。

那天是大年二十九。凌晨武汉宣布封城，下午邓磊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大年初一随四川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前往武汉支援。当时，邓磊一家人在提前吃团饭，一时间，桌上的人都陷入了沉默。

作为四川省人民医院EICU的副主任医师，邓磊常年与危急重症打交道，先后参与过汶川、玉树、芦山地震急救，“派我去，连妻子都觉得是必然”。

话虽如此，当时武汉形势严峻，人们对新冠病毒了解又很少，一线到底有多大风险谁也说不清。上飞机前，邓磊想方设法在家里储备了800个饺子，给妻子李菲菲留下一句话：“银行卡密码你都知道，家里有你，我放心。”

此时在武汉，王登福第二次接到了病危通知书。他的妻子，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党委书记黄桂华感染新冠肺炎后病情持续加重，已经命悬一线。

黄桂华的病房外，医护总数不足400人，床位仅有300余张的红十字会医院，每天有七八百位发热患者前来就诊。院内感染严重，医疗物资紧缺，一切都在崩溃边缘。1月26日，当邓磊所在的小组进驻时，有医护人员在电梯里看到他们就哭出了声。

黄桂华成了邓磊和同事在武汉接手的第一位重症病人。“病人交给我们，这里有感染风险，你赶紧离开。”直到现在，王登福还记得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黄晓波对他说的这句话。

邓磊被安排到重症监护室工作，那里有江汉区病情最严重的一部分患者。一方面，要为了医护人员的安全进行“三区两通道”改造，一方面是限于人力、物力，大量病人无法收治，再一方面，还要面对前期重症患者不断离去。在红十字会医院最初的一周多时间，援鄂医护人员每天都被无穷无尽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

很快，欧美大学2021年的春季学期就要到来，有的获得签证的学生准备接种疫苗后“勇敢”向前走，但大多数的留学生家庭依然选择观望。经历了最初的慌乱、焦虑，这个群体似乎已经适应了曾经确定的、可以预期的轨迹一去不复返。

羽嘉没再执着于立即出国。学期后半段，她每天午夜时分会发一条朋友圈“早安，一天开始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再发一条：“下课，准备睡觉，晚安。”

在武汉期间，邓磊(左)为新冠肺炎患者插管。受访者的供图

“疫”线归来的医者

本报记者 李娜

“师傅一口答应连夜给赶制出来”。

从武汉撤回后，邓磊很快回到了原本的岗位，生活也恢复到往常的节奏。由于当天有重要的医疗任务，他甚至没能与黄桂华见上一面，只有同事转交的热干面提醒着特殊客人的到来。

不过，邓磊与红十字会医院的故事一直没有结束。近两个月的全力以赴让他对医者的责任和使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医患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此外，两所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已建立了“重症数据管理专科联盟”，通过实时数据共享和线上指导，实现长久合作。

2021年，邓磊还有一个心愿，“等有时间，带着妻子孩子去一趟武汉，去看看那座城市恢复如初的烟火气”。

2020年秋季学期，上海纽约大学临时额外招收了2800多名学生，其中大多数是在纽约校区注册的中国留学生。

人民视觉供图

包裹着。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手边的药，也不能完全相信床旁的设备，我们只能努力到无计可施，然后百分百地相信病人。”在与妻子的一次通话里，邓磊这样说。

那个冬春之交，太多的画面、细节被写进了无数的报道里。为节约防护服数十个小时滴水不沾的护士，随时准备出发的志愿车队司机，病人去世后决定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的家属……对邓磊来说，到最后，一切都浓缩成了几个数字：援鄂54天，参与抢救58人次，最长的夜班持续14小时，22名危重症患者经他之手离开ICU逐渐康复。

这其中，就包括黄桂华——经过44天的治疗，她出院了。

在武汉期间，黄晓波曾与红十字会医院的院长约定，疫情过去后他要和队员重回武汉，与并肩作战的同行一起喝一顿酒。还没等到这个约定践行，当年8月19日第三个“中国医师节”，黄桂华与医院的一部分同事就带着热干面和锦旗赶到四川省人民医院看望曾经援助过他们的医护人员。一同去成都的还有王登福，“我要作为病人家属去感谢他们”。

黄桂华说，由于时间仓促，本来锦旗已来不及制作，但听说是送给曾驰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

邓磊的妻子李菲菲画下邓磊前往武汉前的画面。受访者的供图

版式设计：陈子蕴

解封后的武汉城

这名工人。

有的时候，67岁的陈大桥会觉得疫情帮了自己一个忙。以前老伴儿总爱拉着他逛市场、超市，“每天一小逛，每周一大逛”。现在，他们顶多一周采购一次，每次去之前会列出购物清单，到了地方直奔主题，常常半个小时就搞定回家。

现在的武汉可能是全国老人“最智能化”的城市之一。陈大桥身边六七十岁的老人，大多都在疫情期间快速学会了网购和手机下单，“最不济的也知道手机支付了”。直到现在，他所在的小区仍然有人坚持使用社区团购，能不去人员密集场所就不去。

同样在坚持的还有特殊的发热就诊途径。目前，武汉各医院的发热门诊仍不对个人开放，发热病人需通过所在社区安排方可就诊。在武汉普爱医院工作的高星每天从一个门进，另一个门出，“每个医院都是这样闭环管理，全体职工还会定期接受核酸检测”。

12月31日，位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近的一座天桥，成了武汉2020年最后一位“网红”。天桥两边的护栏由玻璃组成，玻璃上刻着年初支援湖北抗疫的各省市和解放军医疗队的名称、人数以及驰援城市。专门赶来的市民王女士为3岁的女儿一个个读出这些文字，她想让孩子从小懂得感恩。

有人早在此之前就为感恩采取了行动。2020年9月，曾在家中阳台敲锣救母的李丽娜通过微博晒出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成功认定书，她说，如果可以，她愿意在生命终结时捐出所有有用器官。

一场劫难后，生命和爱的意义在武汉人心中早已不同以往。据武汉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骆钢强透露，还在疫情期间，就有不少市民通过多种途径咨询器官捐献事宜。下半年管理中心正常运转后，不断有人前来提出申请。“半年时间，登记人数已经超过了以往全年的数量”。

年增长了60%。在义乌，因欧美疫情形势严峻居家人数增加，仅圣诞商品一项就出现“爆单”现象。“根本接不过来”，有生产商表示。

去年第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88万亿元，其中出口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创下季度历史新高。

“靠下半年的加速度，2020年全年营收额与前一年基本持平。”张龙一边说，一边又朝着车间走去，“往后内销外贸一起发力，再大的困难也难不住我们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二维码

坐过山车的外贸人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实习生 林倩惠

他到各国参加电子电路展览会的照片，“做外贸的，要想办法在国际上给自己增加‘曝光度’”。但受疫情影响，出国在去年成了一件大难事，通常定于七八月密集举办的展会也纷纷延期。

在杭州，在义乌，在诸暨，在东莞，无数个“张龙”和他们的企业命悬一线。

赶在新订单之前来的，是政府的帮扶政策。2月，企业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税款政策出台；3月，我国提高了1000余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并加强国际物流供应链保障；森讯隆所在的杭州市为中小企业推出远低于市场利率的应急贷款……

6月下旬，张龙在上海参加了2020年第一次

电子电路展览会。想要活下去，开辟国内市场势在必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医疗用品企业数量激增，随之而来的对相关原料的巨大需求。森讯隆生产的电路板，就是许多医疗仪器的必需品。

7月，订单量触底反弹。8月底，内销与部分恢复的出口订单相加，森讯隆的车间恢复到往年同等开工状态。进入第四季度，张龙手里的订单已排到了2021年。

在东莞，作为支柱产业的玩具行业也在下半年迎来大翻盘，有企业2020年的全年订单比2019